

1989 - 2030 年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研究

孙炜红 谭远发

摘要:婚姻挤压是由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女两性人口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而形成的,反映了一个队列人口潜在的择偶压力。本文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和婚配性别比法,测算我国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9 - 2010 年我国婚姻挤压突升突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度男性与女性婚姻挤压;2011 - 2030 年,我国婚姻挤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大,到 2030 年 MR 值高达 119.86,为中度男性婚姻挤压,这期间会导致少数男性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现实中夫妇婚龄差、通婚圈的逐渐扩大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婚姻市场的潜在择偶压力。

关键词:队列要素法 初婚市场 婚配性别比 婚姻挤压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尽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 2009 年的 119.45,下降到 2010 年的 117.94,再到 2011 年的 117.78,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30 余年来首次出现“三连降”。但仍超出国际警戒线即出生性别比 105 ± 2 的范围,这会导致未来婚姻市场中女性或男性数量的相对不足,造成婚姻挤压现象。婚姻挤压是一夫一妻制下,由于婚姻市场的供需失衡,即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女性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由此导致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照传统“男高女低”的择偶模式选择配偶的现象(陈友华,2004:2)。而这里的婚姻市场早在 1991 年拉曼纳和尼雷德门就指出是婚龄期男性和女性择偶关系的总和(Lamanna & Riedmann,1991:214 - 219)。它属于社会领域的范畴,不是严格意义的市场,它表现为在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婚姻领域内,人们对婚姻配偶的供给和需求关系(Lamanna & Riedmann,1991:586 - 587)。随着贫困地区的“媳妇荒”、“买卖新娘”等问题不断涌现,网络媒体持续报道“光棍”危机,称到 2020 年将有 3500 万男“光棍”出现。这可能会引发婚姻家庭道德危机以及社会安全隐患等问题。

是什么原因引起婚姻挤压的产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夫妇婚龄差拉大?还是出生人口数的下降?贝勒斯(Beiles,1974:265 - 278)认为,它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出生性别比;二是死亡率的性别差异;三是出生人口数的变化和夫妇婚龄差。而国内学者姜全保、李晓敏等(2013:60 - 67)认为婚姻挤压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B 超技术的不断普及以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多家庭在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对孩子的性别做出选择,以保留男孩,最终导致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因此,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婚姻挤压现象。那么我国婚姻市场中,婚姻挤压的现状如何?婚姻挤压的程度是否严重?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学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着手并主要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即从生育率的下降(顾宝昌、彭希哲,1993:7 - 13;于学军,1995:23 - 26);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于学军,1995:23 - 26;陈友华、乌尔里希,2002:56 - 63;郭志刚、邓国胜,2000:1 - 17;姜全保、李晓敏等,2013:60 - 67)、夫妇婚龄差(郭志刚、邓国胜,2000:1 - 17;姜全保、李晓敏等,2013:60 - 67);婚姻市场中择偶条件的变化(任强、郑维东,1998:24 - 30;李树茁等,2006:1 - 8)等角度来进行探讨。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利用普查数据,从宏观上解读目前我国的婚姻挤压程度(倪晓峰,2008:59 - 64;郑晓茹、陆卫群,2013:236 - 242)以及预测未来婚姻挤压发展的

趋势。研究表明未来 20 - 49 岁男性过剩人数在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增加,到 2025 年将超过 3000 万(陈友华,2004),未来婚姻市场每年有 10% - 15% 男性过剩人口,每年达到 120 - 150 万人,男性婚姻挤压严重(李树苗等,2006:1 - 8;姜全保、果臻等,2010:39 - 46)。随着婚姻挤压结果的累计,未来婚姻市场中终身不婚者的水平将会上升(郭志刚、邓国胜,2000:1 - 17)等。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婚姻挤压的研究较多,但缺少利用年度数据反映我国整体的婚姻挤压度。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指导人们生育行为的背景下,不充分考察逐年间的婚姻挤压度的发展变化而仅利用普查数据反应年度区间的变化是欠妥的。因此,本文基于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第一,本文研究的是静态婚姻挤压,即将婚龄期所有的男性和女性人口都纳入婚姻市场的选择范围内,而不考虑其是否已婚。其优点是反映一个出生队列人口总的潜在择偶压力,故在测度整个婚姻市场的婚姻挤压状况、解释整个队列人口婚姻行为的变化时,静态婚姻挤压更具说服力;第二,在婚姻挤压的测量方法上,本文采用郭志刚、邓国胜(2000)提出的婚配性别比法,但严格参照我国《婚姻法》中法定婚龄(男 ≥ 22 岁,女 ≥ 20 岁)的规定,在一些年龄组中,男女的婚配不能完全满足婚配性别比法中理想夫妇婚配年龄差级即占比之和不为 1 时,重新对夫妇婚龄差的占比进行加权赋值,以提高此方法的可行性;第三,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为基础,运用队列要素法预测 2011 - 2030 年男性 22 - 36 岁和女性 20 - 34 岁人口数,并根据国家公布的 1989 - 2009 年人口统计数据,分别进行婚姻挤压的测算;通过比较 1989 - 2030 的 MR 值变化趋势,发现 2010 年过去与未来 20 年的婚姻挤压水平,总结出我国 1989 - 2030 年整个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挤压程度。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具体实情通过年度的数据,计算 1989 - 2030 年我国婚姻市场中婚配性别比值,整体反映我国婚姻挤压的现状、变化趋势及发展走向,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婚姻挤压的度量方法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出多种婚姻挤压的测量方法。主要有同龄性别比、相对性别比、婚配性别比、婚姻寿命指数、初婚挤压指数、婚姻平衡等方法。婚配性别比法的优点是考虑了男女婚龄差并且是一个综合指标,故本文结合我国 1989 - 2010 年以及预测年份中青年男女的人口数据,运用郭志刚、邓国胜(2000:1 - 17)提出的婚配性别比法并在该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改进,以此测算我国的婚姻挤压。

郭志刚、邓国胜提出的婚配性别比法是指在婚姻市场中,根据理想夫妇年龄差的择偶模式,得出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女性人口数之比。对于整个初婚市场而言,婚配性别比为所有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女性人口数之比。将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分别限定在 22 - 36 岁与 20 - 34 岁范围内,公式如下:

$$MR = \frac{\sum_{y=20}^{34} \sum_{x=y-1}^4 P_x^m \times I_{x-y}}{\sum_{x=22}^{36} \sum_{y=x-1}^4 P_y^f \times I_{x-y}} \times 100 \quad (1)$$

其中:MR 为初婚市场的婚配性别比;

$\sum_{x=y-1}^4 P_x^m \times I_{x-y}$ 为可供 Y 岁女性选择的男性人口;

$\sum_{x=y-1}^4 P_y^f \times I_{x-y}$ 为可供 X 岁男性选择的女性人口。

同时,理想夫妇年龄差模式的选取,如表 1 所示:

表1 理想夫妇年龄差模式

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岁)	4	3	2	1	0	-1	合计
比重(%)	13.98	19.21	19.48	16.86	18.61	11.86	100

资料来源:郭志刚、邓国胜,2000,《中国婚姻挤压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第5期。

本文严格参照198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法定结婚年龄为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的规定,依据理想夫妇年龄差的模式,使得男性在22岁、23岁、34岁、35岁和36岁组以及女性在20岁、21岁、22岁、33岁和34岁组时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的数值不能完全满足以上6个差级,相应的6个占比之和不等于1。鉴于上述婚配性别比法,在实际研究中的不足,故文中对其进行相应的改进,重新对年龄别夫妇婚龄差的占比进行加权赋值,得到新的占比并继续后面的计算。即将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差的比重设定为:

表2 修正的理想夫妇年龄差模式

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差(岁)	4	3	2	1	0	-1	合计
比重(%)	n_4	n_3	n_2	n_1	n_0	n_{-1}	100

若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完全满足郭志刚、邓国胜提出的6个差级,那么 $n_{-1} = 11.86\%$, $n_0 = 18.61\%$, $n_1 = 16.86\%$, $n_2 = 19.48\%$, $n_3 = 19.21\%$, $n_4 = 13.98\%$ 。

当不能完全符合表1中的6个差级,则重新对年龄差的占比进行加权赋值,公式如下:

$$n_x^* = n_x + \frac{n_x}{N} \times M \quad (2)$$

其中: $N = \sum n_x$,表示此时满足丈夫年龄在22-36岁、妻子在20-34岁年龄段之间的理想夫妇婚龄差的比重之和;

$M = 1 - N$,表示不满足丈夫年龄在22-36岁、妻子在20-34岁年龄段之间的理想夫妇婚龄差的比重之和;

n_x 为表1中对应的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差的比重。

故依照式(2)重新得出不能完全满足表1中的6个不同差级相对应的比重,再计算出整个初婚市场中的婚配性别比。这样避免了将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男性或者女性纳入婚配性别比法计算中,从而提高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对于不同的MR值对应的婚姻挤压程度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MR值的婚姻挤压程度评判

MR值	<80	80-90	90-100	100	100-110	110-120	>120
婚姻挤压程度	女性高度婚姻挤压	女性中度婚姻挤压	女性轻度婚姻挤压	临界点	男性轻度婚姻挤压	男性中度婚姻挤压	男性高度婚姻挤压

三、数据来源与人口预测的方法

(一)基础数据及质量说明

1989-1995年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996-2009年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30年我国22-36岁男性与20-34岁女性人口数以2010年“六普”数据为基础,采用队列要素法进行预测。

关于“六普”的数据质量,它的迈耶尔指数为1.21小于10,总体质量较好(王金营、戈艳霞,2013);它的联合国综合指数为28.92大于20,表明其年龄结构数据确实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主

要表现在0-9岁低龄组人口数据的漏报较为严重即女性的漏报率为6.16%,男性为5.30%;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但重大于漏,这主要是由于“六普”采取“两头登记,事后匹配”的方式引起的。尽管“六普”数据中低龄组0-9岁组漏报较为严重。不过,到2030年,0-9岁男孩的年龄为20-29岁,达到法定婚龄的为22-29岁,0-9岁的女孩在2030年都达到了法定婚龄。以上年龄组的人口数的降低虽然对区域间的婚姻状况造成一定影响,而本文研究的是全国的静态婚姻挤压,即将婚龄期所有的男性和女性人口都纳入婚姻市场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可以认为婚龄期的男女是一个闭合人口,则此时对婚配性别比的测算值MR的影响较小。同时,针对20-45岁人口的重报大于漏报现象,首先,20年后该年龄段的人口都逐步到达40-65岁组,不在本文的研究年龄范围内;其次,达到该年龄段的女性在2010年时都已进入育龄期(生育事件发生在15-49岁)开始生育,新生儿在20年后又逐步进入婚姻市场进行婚配,在一定水平上增加了婚龄期的人口,但对全国整体婚姻市场的影响较小。

(二) 未来人口数据采用队列要素法预测

人口是时间的函数(李永胜,2008:352-353)。为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运用PADIS—INT软件,利用队列要素法逐年对我国2011-2030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中等水平的预测。队列要素法的理论基础是对某一区域的人口数目按照性别、年龄分组,设定其在将来某一时间的变量率,据此来计算在该时期内的出生、死亡与净迁移数。即

$$P_{t(x+1)} = P_{t(x)} + B_{t(x)} + M_{t(x)} - D_{t(x)}$$

其中, $P_{t(x)}$ 表示t年的人口基数, $B_{t(x)}$ 、 $M_{t(x)}$ 与 $D_{t(x)}$ 分别是t年的出生人数、净迁移人数和死亡人口数。

人口总数的变动实际是出生、死亡、迁移的综合结果。通常预测全国的人口数时,影响人口总数增减的主要是出生和死亡,迁入与迁出人数之差往往忽略不计(查瑞传,1980:23-30;李永胜,2004:68-72);同时,国际人口的净迁移率较低(李新运、徐瑶玉、吴学猛,2014:47-53)。因此,本文人口总数的预测是对未来各年出生和死亡人数的预测,不考虑人口的迁移。主要的预测参数有如下:基年分年龄与性别的人口数;预测期间的平均预期寿命;预测期间的死亡模式;预测期间的生育水平以及预测期间的出生性别比。

1. 基年分年龄与性别的人口数

本文以“六普”数据为基础,故基年的分年龄与性别的人口数,对应为2010年的男性0-100岁、女性0-100岁的人口数。

2. 预测年度的平均预期寿命

通常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正向指标。预期寿命的变化取决于死亡率水平的真实变化与死亡的年龄分布两个方面的影响(曾毅,2011:113)。死亡率在年龄别上呈低龄组与高龄组两头高,中间年龄组低的“U”型分布的特点;性别上,男性人口各年龄组的死亡率高于女性的死亡率。本文根据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男性与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差异,进行线性趋势外推,得到2011-2030年男性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差,最后逐步计算出未来20年分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

3. 死亡模式的选择

本文运用PADIS—INT软件对我国未来20年的人口进行预测,软件中可供选择的死亡模式只有寇尔-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和联合国发展中模型生命表。因寇尔-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是对192张可靠的生命表进行筛选、归纳得出,具有数据来源可靠;也可以反映区域间死亡率的差异;同时在四个区域模型中,西区模型生命表的数据主要源自非洲和亚洲(李新运等,2014:47-53)。本文预测的是中国的人口数据,为提高预测数据准确性,故选择寇尔-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

4. 预测期间的生育水平

从“六普”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18,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最低的水平,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重报和育龄妇女的抽样偏误等问题,低估了全国的生育水平。学者们对“六普”数据的总和生育率进行重新估计为 1.4 - 1.6(王金营、戈艳霞,2013:22 - 33;崔红艳、徐岚、李睿,2013:10 - 21;陈卫、杨胜慧,2014:16 - 24 等)。故将 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调整为 1.50。同时,2013 年底国家已经提出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这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第一次由过去的“控”向“放”的改变(乔晓春,2015:26 - 34)。“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有短期生育率的增长,但不会出现明显的反弹。人口学家翟振武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将会带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回升,最高点可能超过 1.8,但不会超 2.0(李新运、徐瑶玉、吴学猛,2014:47 - 53)。因此,本研究参照李新运等的研究将生育水平设定为从 2010 年的 1.5 逐步上升到 2016 年达到最高点 1.94,之后开始下降并到 2020 年下降到 1.80,2020 - 2030 年将维持在该水平上。

5. 预测期间的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波动将直接影响未来人口的婚配情况。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发现,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从 1984 年(108.5)开始到 2014 年(115.88)出生性别比都高于“国际警戒线”即 103 - 107,但 2009 年(119.45)到 2014 年(115.88),出生性别比首次出现连降的现象。同时,王钦池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出现“拐点”(王钦池,2012:3 - 11),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李新运等,2014:47 - 53)。因此,本文依据 2010 年“六普”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 118.06 为基准,参照李新运等(2014)的研究,假设经过 15 年的时间实现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到 2025 年线性递减到 107,从 2026 - 2030 年保持在 107 的水平不变。

四、结果与讨论

(一)1989 - 2009 年我国的婚配性别比突升突降

通过国家公布的 1989 - 2009 年的人口数据测算出我国婚姻挤压 MR 值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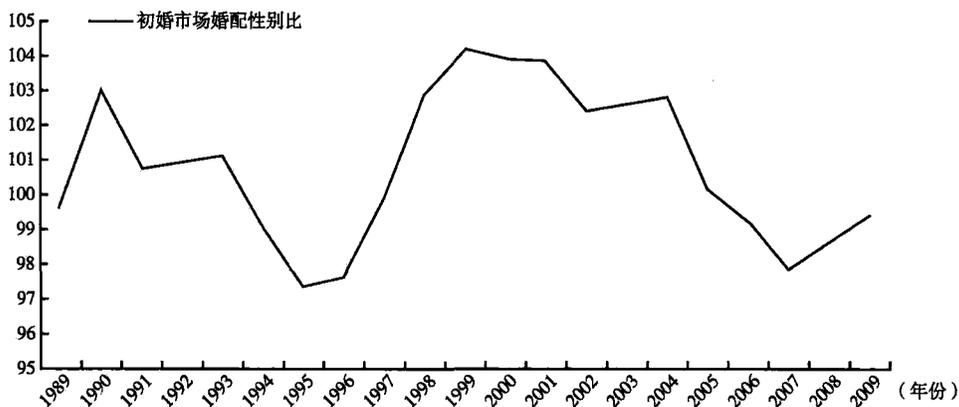


图 1 我国 1989 - 2009 年初婚市场婚配性别比

图 1 中,由国家公布的数据得出,中国整个初婚市场婚配性别比 MR 值从 1989 年的 99.64 增加到 1993 的 101.14 后,1996 年下降到 97.61,2000 年又上升到 103.93,最后,再从 100.93 缓慢下降到 2005 年的 100.15 直至 2009 年的 99.41。故 1989 年到 2009 年我国婚姻挤压程度呈波纹状变化趋势,即有升有降、各年度间的升降程度不一致,但总体上从 1989 年的 99.64 下降到 2009 年的 99.41,下降了 0.23 个百分点。20 年来我国婚姻挤压程度不明显,几乎保持在正常值 100 的周围,进行小范围的波动,这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关。第一,我国 1969 年至 1989 年的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波动,没有出生性别比突变的现象;第二,1969 至 1989 年间,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

口规模数不断增加。我国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即从1962年开始,持续至1973年,这个阶段是我国历史上出生人口规模数最多、人口出生率最高的时间段;同时,在1982 - 1989年间,由于第二次生育高峰期,新增的人口已经成家立业,逐步进入生育年龄,故出现我国的第三次生育高峰,带来新出生人口的又一次增加。目前,第三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婚姻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挤压度;第三,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传统的婚姻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男女通婚半径小,择偶方式相对单一,通常是父母包办,跨地域间的婚配较少。总体看来,整个婚姻市场的婚姻挤压度相对稳定。

(二)2011 - 2030 年我国婚姻挤压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1 - 2030 年我国婚姻市场的婚配性别比 MR 值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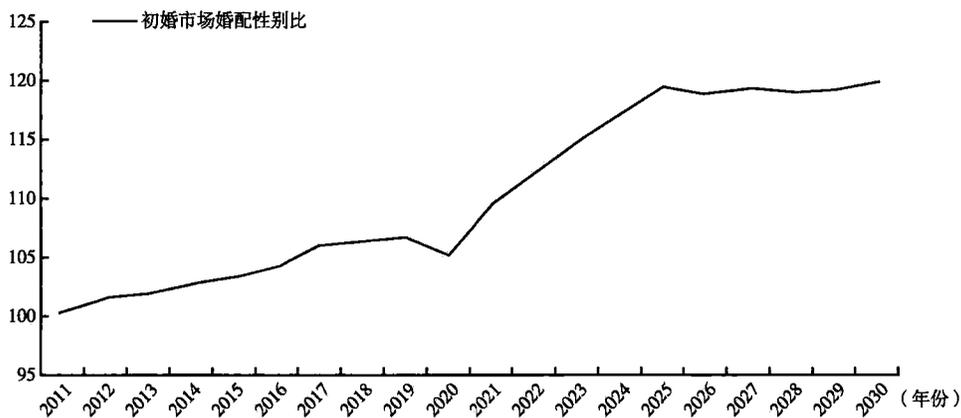


图 2 我国 2011 - 2030 年初婚市场婚配性别比

上图显示,在 2011 - 2030 年我国初婚市场婚配性别比值逐年上升,婚姻挤压度呈上升的趋势。婚配性别比 MR 值由 2011 年的 100.41 上升到 2030 年的 119.86,上升幅度大,上升了 19.37 个百分点。同时,2011 年至 2030 年的 MR 值都大于 100,表现出男性婚姻挤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MR 值逐年升高,到 2030 年达到最大值为 119.86,说明在 2030 年整个初婚市场中 20 - 34 岁女性可供选择的男性人口与 22 - 36 岁男性可供选择的女性人口之比为 119.86,男性受挤压的程度严重。这可能与我国 9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出生性别比持续高涨相关;其次,可能缘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教育素质的提高,2010 年“六普”数据显示,高等教育(大专以上的学历)人口比重为 10.89%,相比于 2000 年“五普”的 4.85%,增长了 6.04 个百分点。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最佳的学习时期与个人婚恋期冲突,很多高学历的女性选择继续深造,而延缓考虑个人的婚恋问题;再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型的社会产物,逐步转变个人的婚姻观念,尤其是年轻人崇尚追求自由、开放的婚姻观念,不婚者、同性恋家庭等新型群体渐渐走近人们的视野,从而加剧了婚龄男女中性别结构的失衡;最后,通过分析“六普”数据资料发现,男女两性的死亡率随着年龄的递增而不断增加,同时男性增加的幅度高于女性,女性的死亡率从 20 岁的 0.30‰ 到 36 岁的 0.66‰,增加了 0.36 个千分点;男性死亡率从 20 岁的 0.65‰ 增加到 34 岁的 1.28‰,增长了 0.63 个千分点,高于女性 0.27 个千分点。故死亡人口的性别比增大也可能引起婚姻市场中婚配性别比的失衡。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六普”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 2011 - 2030 年的人口数据,同时,根据现有数据,查找出 1989 - 2010 年的人口数据,并测量婚姻挤压,分析我国婚姻挤压的现状 & 未来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1989-2010年总体上我国婚姻挤压度降低,整体波动幅度不大,婚姻市场婚配性别比MR值在临界值100的周围上下波动,说明不仅呈现男性婚姻挤压也有女性婚姻挤压,但这21年间的MR值均小于110,表现为轻度婚姻挤压,对于终身不婚人口占比的影响不大;2011-2030年我国婚姻挤压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初婚市场的婚配性别比MR值都大于100,突出表现为男性婚姻挤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挤压度越高。从2011-2021年,MR值均小于110,表现出轻度婚姻挤压;从2022年开始MR值突破110,由112.24增长到2030年的119.86,为中度婚姻挤压,临近高度婚姻挤压值120,即整个初婚市场中20-34岁女性可供选择的所有男性人口与22-36岁男性可供选择的所有女性人口之比为119.86。这个阶段会导致一些男性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

尽管我国未来婚姻市场中婚姻挤压度逐年增高,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夫妇的婚龄差都呈现拉大的趋势,现实生活中夫妇年龄差可能不会局限在-1-4岁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男性的择偶圈,缓解了男性的婚姻挤压度;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的开放,跨国婚姻的现象日益增加,丰富了婚姻市场择偶的选择性,而本研究未考虑到国际间迁移人口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实际的婚姻挤压MR值,故可能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度并不像大众媒体宣传的那么高;最后,贝勒斯(Beiles,1974:265-278)曾提出,出生人口数的变化是影响婚姻挤压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切实落实“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增加未来新生儿人口规模数,缓解我国低生育率的现实困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整个婚姻市场中潜在的择偶压力。

参考文献:

- 陈卫、杨胜慧,2014,《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再估计》,《人口研究》第6期。
- 陈友华,2004,《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陈友华、米勒·乌里希,2002,《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人口研究》第3期。
- 崔红艳、徐岚、李睿,2013,《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人口研究》第1期。
- 顾宝昌、彭希哲,1993,《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人口学刊》第1期。
- 郭志刚、邓国胜,2000,《中国婚姻拥挤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第3期。
- 姜全保、果臻、李树苗,2010,《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研究》,《人口与发展》第3期。
- 姜全保、李晓敏、Marus W. Feldman,2013,《中国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李树苗、姜全保、伊莎贝尔·阿塔尼、费尔德曼,2006,《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人口与经济》第4期。
- 李新运、徐瑶玉、吴学猛,2014,《“单独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自然变动的预测》,《经济与管理评论》第5期。
- 李永胜,2004,《人口预测中的模型选择与参数认定》,《财经科学》第2期。
- ,2008,《人口统计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倪晓峰,2008,《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南方人口》第1期。
- 乔晓春,2015,《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任强、郑维东,1998,《我国婚姻市场挤压的决定因素》,《人口学刊》第5期。
- 王金营、戈艳霞,2013,《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及对以往人口变动分析校正》,《人口研究》第1期。
- 王钦池,2012,《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人口学刊》第3期。
- 于学军,1995,《论我国婚姻市场“挤压”的人口学因素》,《人口学刊》第5期。
- 查瑞传,1980,《人口预测的几个基本问题》,《人口研究》第2期。
- 曾毅,2011,《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郑晓茹、陆卫群,2013,《我国农村适婚青年婚姻挤压状况分析》,《社会科学论坛》第2期。
- Beiles, A. 1974, “A Buffered Interaction between Sex Ratio, Age Difference at Marriag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Huma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Sex Ratio Evolution.” *Heredity* 33(2).
- Lamanna, M. A. & A. Riedmann. 1991, *Marriages and Families: Making Choices and Facing Change*.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石金群

greatly compared to the past. Adolescence is the main stage to accept education. Through study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its changing tendency deeply and carefully, we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life development of young men and women with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

Keywords: Education Attainment Gender Inequality Number of Siblings Family Background Rural and Urban Difference

Analysis on Resilience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Rare Diseases

..... *Ji Wenxiao*(69)

Abstract: By selecting method of narrative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ype, strategy, and characteristic of resilience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rare diseas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regarding resilience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rare diseases, there mainly exist the following five categories: type of development and sublimation, type of internal equilibrium, type of turbulence, type of struggle, and type of abandonment; these five categories could be further generalized into 'elite-driven type' and 'resource/system-restricted type'; regarding functioning of family resilienc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come from elites within family and adjustment in famil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ode of behavior, etc.; the main obstacles come from restriction of resource and system as well as individual personality trait,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elements. Currently, family resilience has display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initiative and obvious strategic action under structure's restriction.

Keywords: Rare Diseases Family Type Resilience

The Study on Marriage Squeeze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from 1989 to 2030

..... *Sun Weihong & Tan Yuanfa*(78)

Abstract: Due to larger gap between male population and female population available in marriage market and imbalance in sex ratio, the marriage squeeze is hence formed, it could reflect potential pressure in mate-selection in a cohort popul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this paper adopts method of queue element and method of sex ratio in selection of marriage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marriage squeeze in first marriage market and its changing tren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rom 1989 to 2010, th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abruptly, and embodied in different degree of mild marriage squeeze among males and females; from 2011 to 2030, the degree of marriage squeeze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year after year, the value of MR will reach 119.86 by the year of 2030, it belongs to moderate degree of marriage squeeze among males, and will lead to a few men's unmarried situation in their whole life in this period. Of course, due to gradual enlargement of gap in couple's marriage age and intermarriage circle, plus implementation of two children policy towards couples either one of whom is 'single only child', the potential pressure of mate-selection in future market of marriage will be 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Queue Element Method First Marriage Market Sex Ratio in Selection of Marriage Marriage Squeeze

Are Hen-pecked Husbands Happy in Their Marriage? *Zhu Bin & Qiao Tianyu*(85)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men's relative status in family power structure on their marriage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lative inferior status in family power structure (hen-pecked) may decrease men's marriage satisfaction. However, this kind of negative influence will change with concrete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for men living in areas more affected by modernization, this kind of negative influence is not significant; on the other hand, for men with higher social economical status, they might transfer partial family power to their wives due to consideration of love and need, hence this will not lead to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ir marriage satisfaction.

Keywords: Marriage Satisfaction Family Power Structure Modernization Resource Dependence